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地位的转移

——以结社为中心的讨论

邱 睿

(西南大学 国际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造成了一大批文人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空间迁移,也随之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人文群体分布。文人群体在新的地理空间的聚合也衍生了各种文人结社,这展示了文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学语境的建构之中。诗社的地理分布变化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关键词:清末民初;京沪诗坛;结社

作者简介:邱睿(1981—),女,四川内江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代诗文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诗人群体研究——以南社为中心”(项目编号:12YJC75106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3-0141-09 **收稿日期:**2014-01-25

清末民初是一个敏感的文学时间,这个时间承载了文人身份的巨大转型,当一系列更改历史的事件发生时,文人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定位,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空间处境。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段里接连发生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文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在城市之间迁移,这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人文群体分布,并衍生出了各种文人结社,也构成了新的文坛生态。

清末民初的文学地理空间版图的焦点无疑是北京与上海。北京和上海是清末民初文人汇聚最多的两个城市。但这两个城市涵育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文人置身于这两个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都是迥异的,故文学创作的产出样态也各具特色。本文聚焦于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事件下的北京、上海的诗歌社团,关

注当时诗坛生态构型的内因。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京沪诗坛:图新与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个事件的前后,北京和上海以其鲜明的城市政治文化趣味吸引着不同的诗人群体。北京作为王朝的中心,正在经历鼎革前后的巨大政治落差;而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革命文人、遗老、富商结社的渊薮。京沪诗坛在政治事件面前标举着各自的政治趣味,这也反映在诗人的结社活动之中。

(一)北京诗坛的王朝挽歌:庚戌诗社、辛亥诗社

辛亥革命之前的京师诗坛曾有一度繁荣,因为这一时期京师聚集了大量的政客诗人,他们大

多曾因为 1898 年戊戌政变的失败而被外放,这些政客诗人的离开造成了京师诗坛的“十年萧寂”。但是在辛亥革命这场暴风雨到来之前,清王朝也有着山雨欲来之前的预感,希望采取措施挽救王朝的颠覆,又纷纷起用外放官员,于是辛亥前的京师诗坛汇聚了一批政客诗人,他们虽然没有为垂暮的清王朝带来政治上的中兴,却造就了清亡之前诗坛的最后繁荣。陈衍如此形容这一时期的诗坛面貌:

都下诗人,十余年来颇复萧寂。自余丁未入都,广雅相国入枢廷,樊山、实甫、芸子俱至,继而弢庵、右衡、病山、梅庵、确士、子言先后至。计余居都门五年,相从为五七言诗者,无虑数十人。讨论之契,无如赵尧生(熙)、陈仁先(曾寿);进学之猛,无如罗揆东(惇) 梁众异(鸿志) 黄秋岳(濬)。^[1]

陈衍于 1907 年春入京,由学部任命在总务司审定科兼参事厅行走,并兼主京师大学堂经学讲席,他入京后很快成为京师文酒之会的中心人物。陈衍“居都门五年”的日子里,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京师交游网络,既有唐诗派的诗人,如樊增祥、易顺鼎;又有宋诗派诗人,如赵熙、陈曾寿,并且陈衍还着力培养了一批弟子,成为这一时期京师诗坛一股后劲之力,如罗揆东、梁众异、黄秋岳。

这个诗人群体组织诗社频繁雅集,成为辛亥革命前京师诗坛繁荣的最突出表现,他们在庚戌、辛亥年均有关诗社之举。庚戌年(1910)成立庚戌诗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载录道:“庚戌一春,尧生、瘦唐、刚甫、毅夫、叔海、东诸同人创为诗社。上巳余与叔海为主人,集于天宁寺,晚饮于余寓斋。”^[1]诗社成员包括陈衍、赵熙、胡思敬、江瀚、江庸、曾习经、罗揆东、胡琳章、陈宝琛、郑孝胥、陈衍、林纾、江瀚、罗惇齋等^[2],这些成员多为京师名士。

辛亥年(1911)的十一月清王朝被革命者推翻,而这一年的前半期京师的文酒之会却极其鼎盛,“是年文酒之会愈盛”^[2]。辛亥诗社在这一年的正月至五月间聚会频繁,陈衍的年谱中均有详细记载。诗社以京师名胜特别是古刹作为集会之所,故梁鸿志诗有“社集如游僧,旬月遍诸寺”^[3]之说。雅集多留有诗画,极尽文酒风流之胜,据林纾记载:“辛亥春,罗揆东集同人为诗社。社集必选名胜之地,每集必请余作画,众系以诗。”^[4]

序在频繁而颇具文人趣味的诗社雅集中我们体验到辛亥革命之前京师诗坛的盛况。

但是我们也留意到,雅集诗歌的情绪充满了风流自赏之外的伤感,诗歌中弥漫的不是太平盛世的闲适自得,而是在变世之前事无可为的无奈。整个王朝已经处于覆亡前夕,但是这群汇聚京师的官员对于重振朝纲却有心无力,只能萧寺赏花,寓庐微酒。所以,在王朝大变革之前的京师诗坛,表面上一派诗酒流觞的繁华,但是这种盛景背后,却是末世的辛酸与无奈。

(二)上海诗坛的新兴革命群体:南社

当京师有庚戌、辛亥诗社之举时,在南方正发展着一个具有不同政治趣味的文人社团——南社。

辛亥革命之前的两年,即 1909 年,当京师的政客诗人在名刹和寓庐开始雅集时,19 位文人也在苏州城外虎丘山下的张东阳祠开始了其第一次雅集。这场看似普通的文人聚会,却掀开了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的历史,这个社团名叫“南社”。南社的名称,已然包含了结社的意图,那就是“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5]。南社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宗旨一致,可谓为同盟会的文字机关,此次雅集的 19 人中有 14 人都是同盟会会员。

此后南社的活动中心转移至上海。南社可考的 18 次雅集,以及 4 次临时雅集,除了第一、二次及 1915 年西泠印社雅集分别在苏州、杭州举行外,均举行于上海。第一次雅集地选择苏州,显示了南社对于历史的某种态度,举行雅集的苏州张公祠纪念的是明末抗清殉节的苏州巡抚张东阳,苏州虎丘则是复社千人大会的举行地,南社成立之初需要礼敬民族节操,也需上溯“几复风流”,这种历史的征引使得苏州成为南社成立的首选地,上海却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含量。但是南社要壮大,特别是想要成为影响全国的大社团,需要上海这座文化新宠城市的鼓扬,这是苏州无法提供的资源优势,故上海成为了南社的核心活动场域。

南社中的反清志士聚集上海,首先缘于上海特殊的租界文化。1863 年,美国领事熙华德(G.F. Seward)在与上海道订立的美租界划分章程中表

参加虎丘雅集的 19 人为:陈巢南、柳亚子、朱梁任、庞蘅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林秋叶、蔡哲夫、景秋陆、张采甄、张季龙。其中,张采甄、张季龙为来宾,其余 17 人为南社社员。

示：“中国官厅对于美租界内中国人民之管辖权，吾人当绝对承认，惟拘票非先经美领事加签，不得拘捕界内任何人等。”^⑥1866年公布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第十六条也规定：“任何外国法庭或审判官，如未得法国总领事之核准，及其所辖巡捕房之协助，不得出票去法租界内拘捕各该管之外国人。”^⑦各种章程使得租界具有特殊的“缝隙效应”，故而租界的“庇护”有时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党即利用上海的租界条件作为活动之保护，到了辛亥革命前，上海再次成为革命党的舆论策源地。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总部设于上海，正是意图利用租界为革命提供保护。南社诸子在南社成立之前即多汇聚于上海，在媒体上为反清造势，出版了《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等，而海外反清刊物也多由上海流传内地，如《新广东》《湖北学生界》《汉声》《湖南》《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

上海的特殊氛围涵育了南社这个反清文人团体的诗歌精神。南社出版有定期的刊物《南社丛刻》，诗人们的很多反清作品都刊布其中，成为清末极具特色的社团刊物。顾颉刚曾这样回忆当时阅读南社作品的感受：“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弃疾）和柳弃疾（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他们俩都是江苏省吴江县人，为了他们激昂的宣传，江浙一带的文人都闻风响应，做起慷慨悲歌、愤世嫉俗的诗来。……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上海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⑧南社诗文中蕴含的革新理想和激昂精神与清末上海租界的氛围形成对比，南社的崛起意味着一股新鲜力量在沪上的生成。南社以其文字宣传作为同盟会政治活动的支持，成为反清的一股劲旅。

南社在辛亥革命之前已逐渐形成规模，在反清旗帜之下聚义者越来越多，1911年2月第一次《通讯录出版》，社友著录有193位。南社入社标准强调气节与文学，且更重气节，“品行文学两优，得社友介绍者，即可入社”^⑨。南社迅速成为沪上引人注目的革命文学社团。

二、两地的遗老结社：遗与不遗的尴尬

（一）沪上遗老的故国之思：超社、逸社

王朝的鼎革，造成了一批身份尴尬的人物，他们坚持对清王朝的忠诚，拒绝接受已经成立的

民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捍卫着和王朝一起存在过的文化体系，他们被称为“遗老”。上海的租界环境在辛亥革命之前给革命者提供庇护，辛亥革命后又成为清遗老们的“避秦桃源”。上海最著名的遗老诗社是超社、逸社。

超社起于癸丑年（1913）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原拟于二月十二日，即小花朝日举行第一次雅集，因追悼隆裕太后而展期十天，这也可见遗老的忠清情结。超社成员有瞿鸿禨、沈曾植、缪荃孙、左绍佐、吴庆坻、王仁东、周树模、陈三立、吴士鉴、林开蕃。其中以缪荃孙年最长，奉为祭酒，瞿鸿禨因在前清官位最高，故出面作召集人，而积极主事者为樊增祥。

超社之名得自瞿鸿禨在长沙归隐时所筑“超览楼”的命意，“超”字展示了遗老们不问世事，沉酣诗酒的生活态度，所谓的“本乏出人头地之思，而惟废我啸歌是惧”，超社每月一聚，以书画、诗钟、击钵等活动为内容。

超社在1913年的雅集颇为频繁，常常一月多聚。但很快便可发现，超于世外只是遗老结社的标榜，“超”只是存在于其诗歌想象世界。此后的遗老行为并不是置身事外的遗逸态度，大多遗老心中并未放弃“中兴”的希望。到了甲寅年（1914），超社活动便不似上一年那样频繁。这一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广揽前清遗臣入京任职，为其帝制造势。这对于上海遗老来说是一次抉择，超社诸子也面临“仕”与“不仕”的决断，有的遗老如瞿鸿禨坚辞不仕民国，“北京政府遣使具币邀请入京，任为参政，却之”^⑩。沈曾植也拒绝征召，“累岁项城聘问不绝，公不应，对使者曰：得之于天，还之于天，不召自至。本年项城又有史馆总纂之招，谢之”^⑪。但是也有遗老进京参加了袁世凯政府，比如樊增祥，他不顾遗老群体的耻笑“绝裾而行”。超社中除樊增祥外，周树模、吴士鉴、左绍佐也没有继续停留在海上超然世外的诗歌世界

“缝隙效应”之说见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四章。租界固然有碍民族情感，然对其管辖缝隙的利用也造就了革命之保护。对于租界的双重意义，参见熊月之：《“国中之国”与进步活动中心》《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见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语出：“樊云门方伯增祥，亦毅然入都供职，其妇尼之，绝裾而行。公欲以鸱鸒天一阁嘲之，但得首句云，从此萧郎是路人。”参见王遽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

里,而进京投于袁世凯幕下,缪荃孙也应清史馆之招出为总纂,这场风波之后的超社便人去园空社事停滞。超社也被人戏谑为“闻召即走”,徒貽笑柄。

超社无形解散之后,乙卯年(1915)在留沪遗老瞿鸿禨的号召下社集重开,将“超社”更名为“逸社”。人员方面有:瞿鸿禨、冯煦、缪荃孙、吴庆坻、王仁东、陈三立、陈夔龙、王乃徵、沈瑜庆、朱祖谋、杨鍾羲、张彬。在原有留沪遗老基础上,又加入陈夔龙、王乃徵、朱祖谋、杨鍾羲、张彬等新成员。此时的主持者为沈曾植,比之超社时代的多聚于樊增祥的樊园,逸社雅集多会于沈曾植的海日楼和陈夔龙的花近楼。

上海的遗老诗社仍然延续诗酒唱和的风貌,虽然名字由“超社”更名为“逸社”,但并无实质变化,社团对于政治的敏感未曾稍减。在袁世凯日紧一日的称帝活动中,遗老的复辟谋划也在暗中进行。当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上演时,逸社成员也多有参与,如逸社的核心人物沈曾植就北上参与张勋复辟:“春,项城称帝号,天下骚然,初公已洞烛其逆迹,谋有以覆之,至是谋益力。与康更生有为等往来擘画,常夜以继日。”^{[11] 365}逸社诸子因为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而无心于诗社雅集,于是逸社再次重复超社的命运,在政治活动中趋于瓦解。

逸社在1917年的复辟活动中趋于停顿,三年之后,即1920年秋,蛰居的沈曾植到南京清凉寺追悼梁鼎芬,遇到陈夔龙,两人颇为感伤,有重举社事的提议。陈夔龙述及此事:“乙庵三年不见客,秋吊梁髯,曾晤于清凉寺,爰有重开逸社之约。”^{[12] 卷一}而遗老诗群也在1917年到1920年这三年间发生了人事的代谢,戊午年(1918)三月十五瞿鸿禨卒,九月二日沈瑜庆卒,己未年(1919)十一月一日缪荃孙卒。这三位遗老的故去大大削减了遗老诗群的力量,也使得新举的逸社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同名实异的状况。

(二)北京诗坛的复杂谱系:春社

辛亥革命后,上海成为了遗老的避秦桃源,但是很快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打乱了遗老们雅集的兴趣,遗老们在新的政治局势面前选择不一,而这种各异的选择也造成了京沪诗坛的遗老名单重新调整。

袁世凯称帝之前,曾召集前清旧臣入都任职,这样北京文坛又出现了旧雨相逢的局面,这些在

辛亥革命后离开京师的政客诗人又再度重聚,一方面希图继续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重拾“庚戌诗社”“辛亥诗社”的雅集之举。他们在1915年组建了“春社”,“社建于暮春之初,故以春名”^{[1] 207}。陈衍曰:“今年三月一日,寓庐有春社之集,集者樊山、笏卿、沈观、叔海、实甫、确士、桐斋、众异、秋岳并余十人。”陈衍在诗话中将春社第一次雅集诸人之诗节摘编排,“以当一篇序记”。

春社仍然以陈衍寓庐为集结地,似有意承续庚戌、辛亥小秀野草堂的人文景观。春社诸人多是辛亥革命前陈衍小秀野草堂的座上客,大家的聚合难免会有一种回忆的参照。然时事迁移,物非人也非,春社缺乏辛亥诗社排日饯饮的盛况,也无复“飞英会”的诗性盎然。陈衍的同光诗派主盟者的身份,更多体现在他的《石遗室诗话》的写作中,而不是具体的诗歌活动组织。陈衍除了参加过春社第一、二次雅集外,并不热衷于其活动。相对于参加具体的诗社活动,这时的陈衍更热衷于写作诗话,把他对辛亥革命前京师文坛的辉煌记忆、对同光体的理解写入他的鸿篇诗话中。春社的活动相对来说是落寞的,京师诗坛并未因为樊增祥等人的到来而有所振作。

因为陈衍在京师的号召力,他成为了春社的召集人,但春社主盟者实为樊增祥,他为春社社长,陈衍有《戏呈樊山社长兼示一厂同社》一诗,以社长称樊。樊增祥来自上海,和他一起从上海北上加入春社的诗人还有左绍佐(号笏卿)、周树模(号沈观)、吴士鉴(号桐斋),他们四人均是沪上著名遗老诗社“超社”成员,桐斋诗云:“三年社帜树海曲,我亦屣屣追履约。”^{[1] 207}这一句涉及诗社中樊山、笏卿、沈观及桐斋在上海结超社之事。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吴士鉴本为超社成员,这样春社的十人中有四人来自上海,使得春

章一山在《答金雪孙前辈书》中写道:“上海壬子以来,故有超社十人,轮流诗酒。甲寅一年,出山者半。王子观察存善戏谓:超字形义,本属闻召即走,此社遂散。”参见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72页。

诗题为《三月一日于东城寓斋为春社首集,集者樊山、沈观、笏卿、叔海、确士、实甫、桐斋、众异、秋岳并余十人,约各为即事诗一首,次日沈观诗先成,次韵示同社诸君》,参见陈衍:《石遗室诗话》,清光绪至民国间1875刻本,卷七,第2页。

《石遗室诗话》是从1912年应梁启超《庸言》杂志之邀开始写作,至1914年夏《庸言》停刊,共刊行诗话十三卷。1915年陈衍又应李拔可之邀继续诗话的写作,刊行于李主编的《东方杂志》,至1918年,共刊行十八卷。

社与上海的超社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这些沪上诗人和在京诗人的重组,使得春社有着一一种微妙的社团氛围。樊增祥等人到京本来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和陈衍等人也有所异趣;诗社中樊山、笏卿、沈观及实甫又为楚人,这种微妙的地缘关系,也使得诗社有着地域上的派别意识。春社体现了袁世凯称帝阶段京师诗坛的复杂面貌,文人的诗歌关系往往有着政治的内里。

三、民国初年的京沪诗坛:政治身份与文化态度

(一)北京诗社的政治怀想:瓶社、著渚吟社

己未年(1919)京师成立了瓶社,这个社团由孙雄发起,主坛站者为郭曾炘,以庆祝翁同龢的九十生辰为由在陶然亭举行了第一次雅集。到者三十二人,多为翁同龢的故旧,尤以门生为多。在京师,存在着以庆祝前贤生辰为由举行雅集的传统,瓶社的设立也是一种对于传统的模拟。杨济谈到:“四月戊寅,实公九十生辰,其门弟子孙吏部雄,效七月五日祝高密郑君故事,为会于京师之陶然亭,以祀公。”^{[13]149}

然而这个诗社的设立不仅在于一种对于传统风雅的模拟,其创立的1919年,距翁同龢去世已然十六年,此时成立瓶社的意味颇值得考量。首先,需要了解作为瓶社精神偶像的翁同龢所具有的历史符号意义。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号叔平,字声甫,晚号松禅,也号瓶庐居士。咸丰时中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并任光绪帝的授读师傅。翁同龢作为清末的一位关键历史人物,与那一段王朝末世关联甚深,于是对于他的纪念正成为回顾历史的一个理由,瓶社诗人纷纷在诗歌中感叹王朝的黍离沧桑。邵瑞彭写道:“人物同光委劫灰,先朝玉殿亦蒿莱。”^{[13]126}宗威感叹:“今日一樽同话旧,故宫禾黍怆宗周。”^{[13]129}丁祖荫诗曰:“同光遗事谁能说,浪道人间书画师。”^{[13]132}

而在对于翁同龢的纪念中,大家不仅仅是闲话沧桑,更重在通过回忆历史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特别是面对民初的政局,当追究混乱的原因时,大家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最初的缘由,回想起1884年那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当时以翁同龢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有过激烈的政治交锋,对此杨济如此总结:

议者往往以甲午之役为公病,余于是乎不能无说。惟时东邻以三岛之强冯陵上国,虔刘我边陲,睥睨我臣民,凡有血气,莫不愤怒。公以为尊君攘夷人同此心,遂发愚民,斗于一战。固不虞人之利其灾而媒孽其后也。国之大柄不在于公而在于人,征兵不至,至则不行,行则无械,宿将为壁上之观,雄镇无糗粮之助,是孰致之然哉?^{[13]149}

杨济提到了主战派“国之大柄”不在手的尴尬,他们缺乏对于将帅的控制权,以及后勤保障的支配权,主战而无力主导战争,却在战败后承受了所有的指责。这种遗憾在瓶社诸子诗文中是意欲发覆澄清的。李岳衡甚至做出一种大胆的历史假设:“倘平东卷鲸鲵浪,焉有南飞乌雀行。废垒枉劳图阵演,寒沙谁解唱筹量。”注曰:“甲午之役,公力主战,起用刘锦棠部署,将行数日间,一病不起,后之将帅均不得其人。论者谓当时苟得知兵之将,用命之士,坚持三月,敌不能支,必无割地赔款之事也。”^{[13]136}在李岳衡看来,苟若翁同龢当年能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战争部署,将帅所用得人,与敌死战,或许不会有割地赔款的民族创痛。瓶社诸子固然有回护翁同龢的意味,但是也表达了清末以来对于政局的看法。

谈到翁同龢不可不论的还有1898年那场让诸多士人心存遗憾的变革运动。戊戌维新被视为清王朝最后一次变革机会,却在短短百日之后被后党镇压下去,翁同龢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一直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外放在当时被视为帝党失败的信号。当1919年瓶社诸子回忆这段往事时不免生出王朝更迭的沧桑。孙雄对于二十年前老师离京的场景记忆犹新:“廿年前事犹如昨,祖饯都门泣数行。”^{[13]115}俞钟奎在此提出翁同龢生日的更多层次的历史感触:“罢官适生日,家国两可记。”^{[13]131}翁同龢罢官出京时正值其生日,这也让以庆祝生辰为理由的瓶社诸子有了更多的历史记

据杨萌芽研究,辛亥诗社以闽派和粤派诗人为主。而辛亥诗社是庚戌诗社的扩充,其中郑孝胥、陈宝琛、林纾系陈衍邀请入社;温肃、潘博系曾习经邀请入社。而这两个地域的诗人中宗宋者居多。参见杨萌芽:《都下雅集:陈衍等宋诗派成员清末在京师的文学活动》,《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瓶社第一次雅集人员无载,诗录第一卷作者可考者共计28人:孙雄、吴昌绶、王照、邵瑞彭、徐元绶、邓谔、朱崧瀛、宋伯鲁、宗威、张一麋、俞钟奎、丁祖荫、寿玺、姚宗堂、张素、连文澂、李岳衡、易顺鼎、齐耀琳、夏孙桐、王存、郭曾炘、张兰思、杨虞、杨济、王式通、关赓麟、周绍昌。

忆。而且伴随老师的罢官,这些故旧门生当时也多受牵连,这是回忆时绕不开的亲身遭际,张素就曾提及“门生及故吏,贬散亦不存”^{〔13〕135}。

瓶社在一种历史追怀中开始其结社,不仅是要延续京师诗坛风雅,更是要借此追怀历史,将民国的现状与清末的政治事件相联系,以此建立政治与历史态度的关联。瓶社本有“岁岁以时会集,讲习壶觞,垂于不替”的打算,然仅见两次雅集记载便归于沉寂。虽然结社并未绵延久长,但其展露的北京诗坛浓郁的政治怀想氛围却颇有代表性。

京师诗社弥漫着一种政治的追怀,这一点著涪吟社也体现得较为典型。著涪吟社由沈宗畸于戊申年(1908)创立于京师,其创社之旨本在于同道之间的文化交流,据《著涪吟社同人录序》载:“岁戊申,番禺沈子于京师肇立吟社,锡名著涪,纪年也。名流墨客,景附云属,曾不逾月,达百余人。来者未艾,杰搆抄传,屑玉唾珠,一

时纸贵。”^{〔14〕191}

从著涪社的创立时间来看,与庚戌诗社和辛亥诗社颇为相似,在王朝的末期,京师文人共同制造着诗坛的最后辉煌。著涪吟社戊申年的同人录载社员共计119名,据同人录称这些文人的汇集“曾不逾月”,可以想见当时京师诗社的壮观。然民国三年(1914)的《著涪吟社同人小传》却展示出这个社团的人事流转,时隔六年,同人小传的社员录仅为12人,且社员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2人中仅金绶熙、沈宗畸、张瑜、吴保琳、成昌五人为1908年已然加入著涪吟社的老社员,延青、陈霞章、嵩堃、周蕴华、萧亮飞、王祖馥、袁祖光7人为新入社员,原有名单上的一百多位社员的消失意味着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对于这个辉煌一时的京师诗社的冲击。此外,将1908年和1914年的同人录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在社员信息载录重点方面的变化(见表1)。

表1 1908年和1914年著涪吟社同人录之对比

《著涪吟社同人录》(1908)	《著涪吟社同人小传》(1914)
金绶熙,号绶青别号勺园,浙江桐乡人,住嘉兴馆	金绶熙,号绶青勺园又号绮佛,年五十八岁,浙江桐乡人,前官补用知府,著有《清雅堂诗文集》《艳雪词钞》《勺园四种曲》,住北京虎坊桥天顺栈,通信处天津北马路德馨栈
沈宗畸,号太侔别号二禹山樵,广东番禺县人,住前青厂番禺新馆	沈宗畸,字孝耕号太侔又号南雅,年五十岁,广东番禺人,己丑举人,前官礼部主事,现充交通部编辑员,著有《南雅堂诗词钞》,现住北京前青厂番禺馆
张瑜,号郁庭别号铁柱轩,顺天大兴县人,住江擦胡同	张瑜,字二周号郁庭别号铁柱轩主,顺天大兴县人,年三十七岁,直隶大兴人,前清布衣,现司法使幕中事,著有《天碧阁诗二卷》《铁花仙馆词》二卷,《六朝艳体诗选》八卷,《谜海》二十六种计百卷,住北京崇文门内箭杆白胡同
吴保琳,号鹿詹别号新樗圃主,安徽歙县人,住驴驹胡同	吴保琳,字林伯号鹿詹,年三十四岁,安徽歙县人,前官同知,著有《吴氏收藏书画史》《古今伪书考》《补新安县吴氏诗文存续编》,住北京广安门大街果子巷聿居胡同
成昌,号子藩别号寄沅,洲厢黄旗人,住驴肉胡同	成昌,字子藩号霁厂,年五十五岁,奉天锦县人,戊子举人,前官四川夔州府知府,著有《退来堂诗词钞》十卷,现住涑水县城内四松巷骆寓

将金绶熙、沈宗畸、张瑜、吴保琳、成昌五位老社员在两份同人录中的信息进行对比,发现信息的扩充展现了社团的某些微妙的政治态度的变

化。1908年的同人录所录信息包括成员姓名、字号、籍贯、住所四项信息,1914年的小传则翔实地记载了社员姓名、字号、年龄、籍贯、前朝科名、

著涪吟社同人录,以入社先后为序,载社员119名:成昌、毓寅、瑞琨、史曾培、宋传曾、王延钊、易顺鼎、袁祖光、唐嘉禾、张瑜、陈之鼎、梁广照、张锡麟、叶恭綽、梁广宽、冒广生、杨鼎元、朱珩、万秉鉴、卓启堂、裴祖椿、刘杼、定信、阿麟、王树荣、梁照、俞寿松、邵赞来、郭肇焜、唐鉴、金绶熙、王继述、熊大垣、金宗源、李承烈、王伦孙、张丙廉、贵贤、贵宝、福善、贾福慧、牟圻、田乐天、周传博、李靖国、嵩麟、李维藩、胡熙寿、张彬、谭祖任、赵调梅、崔鸿、汪如渊、李华、沙彦楷、刘荣禄、王春江、许江、博启图、沈仁垓、钟启贤、刘国钧、金摺卿、秦琴、刘仰勋、王在宣、冷汝楫、江心镜、许元贞、李盛基、金葆贞、吴保琳、朱璞、钱耆孙、王震昌、汪应焜、龚元凯、龚麟书、龚翼星、李国瑜、韩宝忠、冯永源、宋庆溶、什蒙额、谢汝康、景鸿遇、罗兆凤、朱祖诚、王兆声、詹忠策、林淳永、关鼎勋、李权、潘毓椿、丁传靖、余染、孙滋泽、周行遑、蔡中燮、陈维湘、唐尚先、毕有年、于世珍、毛昌遂、白源曾、冯汝玖、张允同、邓纪干、沈尚善、杨述传、廖润鸿、徐仁铨、陈栩、王其田、黄甲第、李伊沅、沈亚贤、沈宗畸、沈宗麟。

前朝官职、现职、著述、住所九项信息。1914年清朝已然覆亡,在社团成员的信息中,却格外强调前朝的科名和任职,使得这个社团的政治身份显得较为突出。这个社团在对于功名和前朝官职的强调中展示了他们在体认社团身份时的态度,他们在对于前朝的追怀中维系着民国初年的诗歌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源于清末的政治关系。

(二)上海诗社的文化感怀:淞社、鸥社

沪上的诗社在民初也在经历着王朝鼎革后的政治调适,但是相对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政治气息没有那样浓郁,沪上诗社在民初甚或开始淡化政治身份的标识,开始用一种文化态度来凝聚诗人群体。清末上海最激进的革命文人群体南社,在民国成立后也经历了其社团的变迁。当反清的社团政治目标实现后,文人的政治迷茫让这个社团在人员构成上也不再以政治态度作为准的,南社与沪上各种文人群体之间有了交集,这种沪上诗歌版图上人员的交融呈现了一种新的诗坛面貌。在此以淞社、鸥社与南社的关系来观察这一段人员交集背后的文化心态呈现。

淞社由周庆云于民国二年(1913)已创立,止于民国十四年(1925),前后延续达13年,总共举行了57次社集。先后入社者有金粟香、许子颂、缪艺风、沈絮斋、钱听邠、吴苍硕、叶鞠裳、王息存、刘谦甫、杨诚之、王旭庄、褚稚昭、李梅庵、郑叔问、李审言、刘语石、施琴南、汪渊若、李樵农、戴子开、吴子修、金甸臣、钱亮臣、潘毅达、汪符生、朱念陶、恽孟乐、李孟符、曹揆一、唐元素、崔磐石、张让三、宗子戴、冯孟余、姚东木、刘保良、李经畚、程子大、况蕙风、吕幼舫、陆纯伯、刘聚卿、张砚孙、胡幼嘉、潘兰史、孙恂如、徐仲可、钱履樛、张石铭、费景韩、王静安、王叔用、洪鹭汀、陆冕侪、吴颖函、缪衡甫、白也诗、长尾雨山、喻长霖、曹恂卿、章一山、恽季申、陶拙存、杨仲庄、胡定丞、徐积余、杨芷甡、童心安、赵叔孺、恽瑾叔、俞瘦石、诸季迟、姚虞琴、孙益庵、褚礼堂、夏剑臣、赵浣孙、胡朴安、刘翰怡、张孟劬、白石农、沈醉愚、戴鬻皋、许松如、王莼农、黄公渚。^[15]^[50]这个名单既有沪上的传统文人,也有南社成员王莼农、胡朴安、徐仲可、潘兰史,还有沪上著名遗老吴子修、缪艺风、王旭庄、章一山。刊行的社团文献包括:《壬癸消寒集一卷》《淞滨吟社甲乙集》《百和香集》《晨风庐唱和诗存十卷》《甲乙消寒集》《晨风庐唱和续集十二卷》。

淞社的主盟者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号湘舲,又自署梦坡,湖州南浔人。周庆云家资饶富,这足以使他有条件主盟风雅。当他因辛亥革命避难上海之后,其寓所“晨风庐”便很快成为沪上文雅集的去处。以富商身份号召风雅,本是江南之传统。元末顾瑛的玉山草堂、清代扬州的马氏小玲珑山馆等都是以商结文的典范,周梦坡可谓民初沪上的代表人物。

周梦坡曾自述其创社因缘:“当辛壬之际,东南人士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携樽,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致。每当酒酣耳热,亦有黍黎麦秀之歌生去国离乡之感者。”^[16]周梦坡希望借结社让避难沪上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抒发异代之感,共同渡过沪上孤寂的客居岁月。但是周梦坡的淞社和超社、逸社的遗民态度不同,他更倾向于一种鼎革沧桑的文化感怀,他既没有超社、逸社那样强烈的政治心绪,更没有南社那样的政治期待,他很大程度上在根据自己的艺文兴趣联结同人。正如刘炳照《晨风庐唱和诗存》序中谈到的:“梦坡伉爽,有经世才,治世余闲,嗜琴酣酒,而尤癖于诗。”^[15]^[70]淞社是周梦坡闲暇的文化寄托,那份庞杂的社员名录也展示了晨风庐访客的文化身份以及被淡化的政治标识。

南社中人不少也是周梦坡晨风庐中的常客,他们参与周梦坡主持的淞社雅集,创作的作品不少还载于《南社丛刻》中,这是一种有趣的诗社间的交流,也使得淞社与沪上著名的革命文人社团之间有了交接。周梦坡晨风庐的南社常客有潘飞声、徐珂、王莼农、胡朴安、白炎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南社社友中,王莼农、胡朴安、白炎既热心淞社雅集也是南社雅集的积极参与者,而潘飞声和徐珂频繁出入晨风庐却从未与身沪上的南社雅集,他们的活动体现了沪上文雅结社的某种特点。

潘飞声(1858—1934)是沪上雅集的积极参与者,时人称他:“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与俱,有座无此公四座不乐之慨。”^[17]潘飞声也自述其沪上生活:“今老隐海滨,闲与二三遗老,品评于炉香茗盃间,回溯沧桑,人琴无恙。”^[18]^[3330]潘飞声鼎革后正是沉浸于一种与遗老们闲话沧桑的生活中,而与革命文人社团南社的交集更多是源于热衷结社的兴

趣而非政治态度的相谋。

南社的另一位名士诗人徐珂(1869—1928)也乐于参加周梦坡的雅集,其诗歌中反复呈现的都是一代异代的沧桑,“几触沧桑感,东京数物华”^{[19]4}、“留眼见沧桑,及时且秉烛”^{[19]11}。徐珂鼎革后的诗歌几乎没有出现过南社诗歌那种剑拔弩张的革命激情,他加入南社更多也是出于一种文人结社的名士作派。胡朴安对潘飞声的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徐珂:“隶籍南社也,只以诗文唱和之故,无有其它意义。”^{[20]102}

沪上文人的—人多社情况值得探究,列名社籍和实际的结社活动应该两观。淞社与南社的交互性体现了鼎革后沪上文人对于结社的某种态度,徐珂与潘飞声恰为代表。他们列籍各种文社,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其政治标识,而是按照自己的文化趣味选择结社。

诗社展示出一种政治身份的淡化和文化态度的融通,还典型地体现在鸥社(1919—1922)身上。鸥社首次雅集成员共11人:傅尊、胡朴安、胡寄尘、汪子实、王蕓农、宋痴萍、汪兰皋、潘兰史、陶小柳、孙小舫、徐仲可。其中,除了孙小舫均是南社社友。且鸥社兴起与南社社员傅尊到沪有关。傅尊的故乡湖南醴陵在1918年遭受严重兵祸,祸首乃为时任湘督的张敬尧。傅尊等人搜集张之罪状前往上海争取南北议和团的支持,开展“驱张运动”。南社社友也因傅尊的到来重温了南社辉煌时期的斗争锋芒:“南社集会,自为周实丹殉义集会以后,激昂慷慨之气,渐渐沉沦,至民国八年、九年,无复声矣。兹集亦稍见南社当年之精神也。”^{[20]169}傅尊到沪使得南社旧友重燃了革命激情,鸥社也作为南社的分支社团与傅尊等人在沪的反军阀活动相始终。

当张敬尧被成功逐出醴陵,傅尊也于1920年7月返回湖南,此后便未再到沪,也没有再参加过鸥社的雅集。此后,鸥社逐渐淡化了革命社团的意味,不再那样激愤时事,请愿呼号,而是呈现出一种与沪上社团相融合的特点。文化革新的浪潮让旧式文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凋零生出共同的担忧,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大家摒除曾经壁垒分明的政治分野和诗歌宗尚,开始在一代对于文化的共同体察中彼此走近。

鸥社社友中胡朴安、王蕓农、汪兰皋、徐珂、潘飞声均是淞社雅集的常客,而他们的鸥社雅集也时常延引淞社成员列席。辛酉年(1921)鸥社的

第33次雅集在正月初四日这天,正好是清代著名布衣诗人黄仲则的生日,潘飞声邀请社友到杏花楼雅集。潘飞声记载了参加雅集者的名单:吴昌硕、恽季申、陶拙存、周梦坡、徐积余、杨子琴、朱念陶、恽董叔、徐仲可、汪兰皋、汤伯迟、胡朴安、汪子实、黄宾虹、王蕓农、蒋少华、董心安。^{[19]36}其中徐仲可、汪兰皋、胡朴安、汪子实、王蕓农既为鸥社社友,又隶籍淞社。此外,吴昌硕、恽季申、陶拙存、周梦坡、徐积余、朱念陶、恽董叔、董心安均为淞社社友。潘飞声集中的诗歌未标明社集的状况,然据徐珂之诗《兰史招饮杏花楼作鸥社三十三集属以黄仲则丁丙正月四日自寿诗韵纪之》记载,这正是鸥社第33次雅集。如无徐珂诗歌之参照,竟或以为该集为淞社的某次雅集,因为淞社社友的到场人数已经确乎“喧宾夺主”了。

至此,社团名称似乎只是一个软性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种当下体验的类似。这些士人多半是固守传统文化的,他们不仅对于民国多变而混乱的政治感到不满,对于文化革新的激进风潮也不适应。他们对于“吾道沦亡”深致忧虑,不再计较诗歌宗派和曾经的政治站队,而在文人结社中共同坚守传统文人的文化理想。

四、清末民初的京沪诗坛版图与政局变迁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的中心地位在不断迁移,很大原因是由于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了大批诗人发生地理位移。北京和上海在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事件中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也成为诗人们或聚或散的理由。京沪诗坛诗人的版图分布因此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这就导致诗坛力量的变化。这个过程中诗社其实是各种诗人群体的聚集样态,体现了清末民初文人的心态。诗社的地理分布变化则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北京和上海的政治氛围导致两地的诗人汇聚具有某种身份指向,北京是政客诗人的聚集地,他们抱着对王朝的忠诚和最后的图新希望在北京这座城市汇集。相对而言的是一个因为特殊的租界效应发展起来的具有

据鸥社发起者之一胡朴安的介绍:“民国九年,我们几个在上海南社的朋友,由子实与我发起,组织了一个鸥社。”诗中言之人,只孙小舫一人,非南社社员,是子实同事也。”参见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52页。

相对政治和舆论自由的上海,那里从清末就汇聚着各种王朝的反对力量,南社是其中的代表。北京、上海两地的诗社成为一种政治上图新和革命的反映。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民国肇兴,政治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诗坛格局也面临重整。辛亥革命之前京师诗酒雅集的盛况结束了,这些京师的政客诗人无暇也无心再继续诗酒风流的生活,他们有的离开了京师,削弱了京师的诗坛力量,其中一部分人转而南下上海,因为上海的租界可以提供革命后的安全庇护,于是上海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诗人最大的聚集地之一。

然而上海最大的遗老结社超社、逸社却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政治事件中风流云散。北京方面,春社则映射了袁世凯称帝阶段京师诗坛的复杂面貌。

梳理民国初年京沪的其他诗社,发现诗社成员的构成也透露了两地的政治信息。在京的诗社人员身份仍然带着浓重的政治味道,他们或在一种具有共识的历史追索中结成诗歌的同盟,或是在一种政治身份的回溯中完成群体身份的共建。然上海的诗社却淡化了这种政治性的群体关系,过去在政治上完全背离的群体之间也能在逐渐共融的文化态度中走向诗歌的交集。

参考文献

- [1]陈衍.石遗室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2]陈声暨.石遗先生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 [3]梁鸿志.爱居阁诗[M].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 [4]林纾.畏庐诗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5]南社长沙雅集纪事[N].太平洋报,1912-10-10.
- [6]梁敬惇.在华领事裁判权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7]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M].倪静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
- [8]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J].中国哲学,1983,(2).
- [9]柳亚子.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10]瞿鸿禨,瞿宣颖.止庵年谱[G]//晚清名儒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11]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G]//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七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 [12]陈夔龙.花近楼诗存五编[M].民国九年刻本.
- [13]瓶社诗录二卷[G]//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4]著涓吟社诗词钞一卷[G]//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5]周延祁.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16]周庆云.淞滨吟社甲集,二集[M].梦坡室,民国四年刻本.
- [17]王蓀农.云外朱楼集[M].上海:中孚书局,1934.
- [18]南社丛刻[M].扬州:江苏广陵出版社,1996.
- [19]徐仲可.真如室诗[M].北京: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刻本.
- [20]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欣杰]